

张欣·都市文学不是一张包装纸 写作不能靠“二手生活”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陈晓楠 孙磊

日前,广州话剧艺术中心开年大戏《索爱》上演,这是作家张欣首次跨界编剧,将自己的电影文学剧本搬上舞台。这部作品是张欣对文学的全新探索,聚焦原生家庭创伤,为观众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,审视当代都市人的情感生活与精神世界。

张欣是一位与中国当代都市同步成长的作家,被誉为“最早找到文学上当今城市感觉的人之一”。她的作品多反映南方沿海城市白领女性的生活,以独特的价值观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力,获得读者的广泛认可。张欣的散文集《泡沫集》展示了她对人心和人性的深入关注,而长篇小说《不在梅边在柳边》和《终极底牌》则出色地描绘了繁华都市中人性的沧桑和考验。

在《索爱》这部原创情感心理话剧中,张欣将自己对城市生活的深刻理解和观念转化为戏剧语言,让都市中凝聚的情感点亮一盏灯。她说,都市文学不写猎奇,也不再遵循过去的套路写人们对物质的你争我夺,而是写能够触及灵魂深处的东西。

近日,张欣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——

一直“灌水”的作家精神会逐渐萎缩

羊城晚报:为何选择跨界创作话剧《索爱》?

张欣:我曾经在部队文工团工作过,对戏剧并不陌生。因此有合适的题材,写一部话剧很正常,没有特殊之处。

羊城晚报:为什么题材聚焦原生家庭的创伤?

张欣:关于选材,我以往主要写现实主义。我们一直在说文学反映现实,但是具体做起来,每个作家的关注点都不同。这次创作,我写一个缺失爱的家庭,写每个人在寻找爱的过程中成长。我会更主动地关注普通人身上的情感,而对宏大叙事比较警惕。如果都是宏大的叙事,细腻的东西就会流失掉。我认为记录这些很具体的个人遭际和情感的心路历程非常有意义。

羊城晚报:在处理现实题材的细微之处时,您怎么把握虚构和非虚构?

张欣:看这个题材适合什么,就用什么办法去写。但因为我是小说家,所以我偏向虚构。近几年非虚构非常盛行,它更接近生

活的真实,大家也非常需要真实。但我认为虚构和非虚构是一体两面,虚构非常考验作家。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从事写作,包括投身网络文学,看起来这条路好走,但我认为是越来越难了。

羊城晚报:为什么觉得写作这条路越来越难?

张欣:因为没有人关注你说什么。每个人都想说,都不想当听众,所以变成所有人都在说。但真正引起我们深思,以及特别触动我们的作品还是比较少。

小说创作并不是越写就越熟,越熟就越吃力。创作永远都是归零的,你写完一部就不能再复制。如果只是搭个架子,一直灌水,这样的作家会逐渐精神萎缩,也并非真正的创作者应有的行为。

我有时会觉得越写越不知道该怎么写,或者经常被这些问题所困扰,但仍然要不断克服并将好的内容呈现出来。小说最重要的是呈现能力,每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作家都在思考如何突破自己,如何把内容呈现得更精准。



《索爱》剧照

要写出读者内心深处的疼痛

羊城晚报:您最近关注的写作题材发生了变化吗?

张欣:我还是比较关注都市生活。前段时间的小说写民国时期的广州,也一样是城市书写,在《花城》杂志发表,书还没出版。我认为作家需要展开一个自己能写的范畴,并且持续发力。

写都市小说,广州可以借鉴的东西并不多,不像北京、上海。要挖掘我们这边的地域风貌和人的气质,实际上还是蛮难的。我是江苏人,从小来到广州,在这生活了很多年,但与地道的广州人相比,认知上还是隔着一层。因此,我也是用外地人的眼光看待现在和过去的广州,也要慢慢了解、接近这个城市和人里人的特质。

羊城晚报:更多是以旁观者的视角来书写广州?

张欣:在广州生活,和你真正动笔创作关于广州的小说,两种感觉不一样。你越是认为你离这个城市很近,和这里的人特别熟

悉,你越写不出来。因为你没有更深入地往前走一步。我在三四十岁时,很想写一个关于广州的故事,但我写不出来,找不到人物身上的魂。然而,过去留下的北京、上海的作品很容易看到“魂”。虽然张爱玲也写过香港,但她的上海戏仍然很丰富。

同样是写城市,你需要找到个性和骨子里的气质。我用了很长时间都找不着,我们对广州的描述太外化了,总是永庆坊、人字拖、美食等,这些因素本身并非文学,文学必须见“人”。我们并非不能写醒狮、龙舟,但如果里面没有人,很难让读者了解这个活生生的社会和里面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,会找不到“人魂”的感觉。

很多作家也在探索,写出来的人物非常有气息。但也有很多写作没有给广大读者留下印象。这仍然是一个如何呈现的问题。当然,无论是我这样的老作家还是年轻作家,大家都在努

力寻找突破瓶颈的机会。我们不一定硬要写出广州的《繁花》,它是一种地域文化特有的,你不可能去走别人走过的路;但我们可以通过努力找出广州本土的东西。作家不能有二手生活,必须自己查资料,自己去想,这个城市让你印象最深的人物是什么?他们身上的魂到底是什么?要自己找到才行。

羊城晚报:这要求作家“田野调查”的功夫够硬?

张欣:是的,但思考更为重要。作家需要反复思考你要表达什么,是什么支撑这个人物这样走过来的,为什么会感动你?现在根本不缺故事,今天听到一个好故事,我这样的老作家不可能直接写出来,不然呈现的东西会比较表面。驾轻就熟的东西写多了就容易有套路。真正的作家要避开热闹,避开热门写作。表面看似热闹的事情,实际上它有更深刻的原因,你需要写出读者内心深处的疼痛。

过于注重意义反而会出现偏差

羊城晚报:城市化的进程伴随阵痛,如今有不少社会学、人类学学者也在关注都市生活中或宏观或微观的问题,同样关注个体的境况。在创作过程中,您会以社会学或人类学的眼光对都市生活进行观察、对话、思考、书写吗?

张欣:你说的偏重学者型作家。我应该想不了那么深远,因为我还是侧重文学的角度。我们对写作的理解应该更加下沉,而不能总是上升。“下沉”非常重要:我们了解多少人的艰辛故事和喜怒哀乐?了解一个打工人每天如何生活、如何解决三餐问题?他最后要回家乡吗?文学应该更加下沉。

有时候过于注重意义反而会出现偏差。但也不是像照相机一样,完全照搬生活的样子,这也不是文学。所以,我认为都市写作的难度也在于此。

羊城晚报:“下沉”是指关注到人心深处、灵魂深处的东西吗?

张欣:正如我之前所说,生活中有许多假象,有时每个人所呈现的与实际的东西存在差

距。互联网提供了很多便捷,但是存在一个问题,即人与人之间存在隔膜。我随便碰到一个人都说自己“社恐”。后来我关照个体的境况。在创作过程中,您会以社会学或人类学的眼光对都市生活进行观察、对话、思考、书写吗?我认为我们在这个时代必须透过现象看到本质。你必须相信有“沉默的大多数”,但他们一定相信真情和真诚的力量。

以前我们可能更多关注一个人是不是成功,或者关注没吃没喝没地方住、饥寒交迫的人。现在更关注“精神上的黑死病”,关注时代的大虚无、大空洞。现在很难找到一个没有任何焦虑的人,很多人都觉得无力。这些问题非常现实,因此我认为都市文学任重道远。都市文学不是写猎奇的东西,也不是像过去的套路一样写人们对物质的你争我夺,而是写能够触及我们灵魂深处的东西。这需要作品能够抚慰人心,如果连痛点也找不到,就别提心灵的抚慰。

情感是苍茫人生中的一盏灯

羊城晚报:您以前说过书写会让您自身得到疗愈?

张欣:书写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。《索爱》的剧本创作就是一个例子,有时候你碰到一件事,你想知道这件事的走向是什么,这是一方面;通过这件事情,你想发声,你想表达你的想法,这是另一方面。我们对于家庭的塑造后来变得很常规化,总是觉得一个家庭后来都会分解,各走各的路,这种做法不对。

所以我认为文学创作的高度不在于从社会学或人类学的角度去写,而在于写一件事时,这件事是否触动了你,让你想要传达些什么。一定要触及人性的东西。我们老说有香港文学塑造的人物形象,流露出赤裸裸的对金钱的热爱,但这就是最接近人性的,所以作品就好看。当然,有的人也有神性的一面。无论如何,关键是一定要打动你。所以不能从

一个模式出发,非要拔高某个人物,这种写作就很难治愈自己。而是从普通人的想法和高度出发,让人物最后与自己和解,就会有治愈的效果。

羊城晚报:您以后会更加关注这种书写方向吗?

张欣:我认为文学肯定要越来越关心我们的精神健康、精神世界。都市文学不是一张包装纸,阅读好的都市文学,即使你什么都没得到,也温暖了你的心。我写《索爱》也提到了一个观点,即情感是苍茫人生中的一盏灯。

羊城晚报:正因如此,您近年作品从揭露冷酷、批判阴暗而逐渐回归到关注人性温暖?

张欣:这是一个过程。作家写到一定程度后就会转变观点,最初认为揭露阴暗更深刻,认为玫瑰色理想主义的东西很矫情,后来回归到关注人们的困境,连接人们的情感。

【有感于思】 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

新的革命加爱情

张平

是一位有多重身份的作家。身份的不断叠加,对一位小说家而言,究竟意味着什么,我们不能简单做出结论;利用得好,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;利用得不好,会对创作形成消解甚至抵牾。在文学创作上,张平已然获得足够多与足够分量的荣誉,但他这样一位具有多重色彩的作家而言,要在文学界确立位置,还需要对其作品有足够多与足够深入的阐释。

最近几年来,张平集中推出了三部长篇小说,他不是以言辞、不是以访谈,而是以长篇小说强势回归。他的最新一部长篇小说《换届》出版,再次证明他在创作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状态。

在我看来,《换届》有这样一些特点。

一是小说保持着正面进攻的姿态。所写的省情、市情,所写

的人情世故,所设计的矛盾冲突以及互相之间的纠缠,都是正面主题故事,而不是其他故事的“背景板”。

二是贯穿始终的革命加爱情故事。杨鹏和夏雨菲的爱情,他们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,成了小说第二条重要的故事线索。同时从小说意义上讲,从人物的情感世界和人物命运的角度讲,又是并驾齐驱的主线,甚至是更吸引读者关注的线索。这条线索和小说正面主题相互纠缠,互动互融,是小说重要的看点。

三是小说保持着依然不落的激情,保持着对正义感的全力追求,保持着对社会、家国前途的关注,以及对具体个人命运的关切。

四是小说对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复杂性、复杂性里所应坚持的主流价值都有充分表现。

就此而言,《换届》不仅是张平个人创作上的新收获,从创作学角度,也有很多启示值得分析。

【旧刊重识】 杨早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

向山田洋次学习

关于电影《沙鸥》

八岁的我只留下了两个印象:一是女排队长沙鸥不吃牛肉,但为了为国争光不得不痛苦地硬吃——天哪,我愿意顿顿吃牛肉!可惜我不是女排队员。二是沙鸥在最苦闷时和男朋友去逛圆明园,漫步在废墟上,画外音说的是“都烧光了,除了石头”“其实世上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,便成了路”。这又是一句我从电影里学到的鲁迅的名言。电影真是那时的好学校。

后来我当然知道《沙鸥》的编剧与导演,是著名的张暖忻,一起编剧还有她的丈夫李陀。人和戏,都是20世纪80年代重要的文艺史符号。当时的宣传口径是:“没有目标就没有生活,崇高的目标使人变得崇高;真正的幸福不在于目标是否达到,而在于为实现目标所作的努力和奋斗,崇高、伟大的目标不是一人所能实现,它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不懈地追求——这就是《沙鸥》给我们的启示!”

新锐评论家郑洞天给《沙鸥》的定位则是:“艺术的翅膀,要永远随人民的

心一起翱翔,这是《沙鸥》给予我们最重要的启示。”

可是,据张暖忻发表在《电影画报》1981年第4期上的《我的追求》上所说,她拍《沙鸥》是希望向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导演德西卡和日本导演山田洋次学习。山田洋次!我想到只有寅次郎与《家族之苦》。没错,张暖忻看重的正是他的电影“在平易淡雅的格调中浸润着含蓄而又浓厚的抒情色彩,常常通过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状态的描写,达到感人至深、催人泪下的强烈艺术效果”。

因此,张暖忻拍《沙鸥》做出了大量的探索性尝试:使用非职业演员担任主角,全部用实景拍摄,并在一些地方采用了现场抢拍和实地偷拍的纪录片式的拍摄方式,她追求的是一种非戏剧化、内在的抒情色彩。“我希望自己能以一种质朴的清新格调,感动观众,赢得观众的认可”。

天哪,我现在好希望《沙鸥》能在影院重映,我再去买票看一遍这部当年因为重雅与擦肩而过的探索电影。

【拒绝流行】

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、大学教授

超越寻找简单结论的阅读

曹林

年少时读书,特别热衷于寻找某个简单的结论,觉得一本书的价值就在于能够“千头万绪,归结为一句话”,找到代表结论的那句话,就觉得已经掌握了这本书的精华,算是读过了。书读多了,自己也写书教书,渐渐意识到,这是一种要不得的肤浅读书习惯,带着中学时代“总结中心思想”“找关键结论”的应试惯性。真正的读书,需要戒除那种“找简单结论”的简化诱惑,而是要读到复杂性。深刻的读书过程,应该总能在掩卷之余在脑海里盘旋这两句话: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那么,问题又来了!

所谓认知肤浅,就是对世界的

了解冻结于某个简化的结论。所以,苏珊·桑塔格说,一切真正的理解,起源于我们不接受这个世界表面所表现出的东西。读一本书,如果读到的仅是某个简单的结论,说明我们对一个问题的认知仍停留在薄和浅的“表层”,没有对“已知”形成某种冲击、碰撞、挑战,它只是既有认知区中某种“熟悉而愉快的确证”“未增加新知的肤浅读书习惯,带着中学时代”总结中心思想”“找关键结论”的应试惯性。真正的读书,需要戒除那种“找简单结论”的简化诱惑,而是要读到复杂性。深刻的读书过程,应该总能在掩卷之余在脑海里盘旋这两句话: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那么,问题又来了!

所谓认知肤浅,就是对世界的

了解冻结于某个简化的结论。所以,苏珊·桑塔格说,一切真正的理解,起源于我们不接受这个世界表面所表现出的东西。读一本书,如果读到的仅是某个简单的结论,说明我们对一个问题的认知仍停留在薄和浅的“表层”,没有对“已知”形成某种冲击、碰撞、挑战,它只是既有认知区中某种“熟悉而愉快的确证”“未增加新知的肤浅读书习惯,带着中学时代”总结中心思想”“找关键结论”的应试惯性。真正的读书,需要戒除那种“找简单结论”的简化诱惑